

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美方有必要汲取基辛格的智慧

国际锐评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受关注的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刚刚度过了他的百岁生日。在这之前，中国新任驻美大使与他会面，表达了中方对他百岁寿辰的祝贺。这体现了中华文化重情重义的传统，也表示出对这位“中国人民老朋友”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赞赏与敬意。

回顾百岁基辛格的外交生涯，1971年秘密访问北京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年，基辛格同中美两国时任领导人一道，推动两个国情不同的国家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这一创举至今仍对中美两国和世界产生重要影响。50多年过去了，中国对美政策保持着连续性

和稳定性，但美方近年来出于错误的对华认知，执意把中国视作最主要对手和长期挑战，导致中美关系偏离了正轨，也让世界陷入了不安。

“在当今真正的多极世界中，(基辛格先生)务实的态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必要。”美国《时代》周刊近日这样评价。当中美关系再次来到十字路口，白宫决策层确实有必要学习并汲取这位百岁老人的外交智慧。

首先，用现实主义眼光，理性务实地理解美国的国家利益。毋庸置疑，基辛格当年推动中美关系破冰，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但一个美国国家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何以能同时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不得不提“现

实主义”这个基辛格外交生涯的鲜明标签。这一标签的含义是把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准确把握国际关系演变，理性务实地制定对外战略。基于这一点，他主张与中国接触合作，建立一个基于互利的中美关系，并认为这么做符合美国利益。

但是今天，美方一些政客更多从高度不确定的情绪去理解美国的国家利益，推行所谓“价值观外交”，组建阵营对抗的“小圈子”，大搞零和博弈。基辛格对此深感忧虑。2019年他就表示中美已处于“冷战的山脚”。在日前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他指出美国在外交政策上始终“自诩正义”，但实际上其他国家并不买账。

显然，美国政客首先要学的，是正确理解美国的国家利益，认识到维护国家利益并不代表就要与中国为敌，就要打压中国的发展空间。在这方面，基辛格博士已经给出了正面示范。

其次，以专业精神更加“纯粹”地推进美国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夹带私货。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党止于两洋”的传统，也就是避免国内政治算计干扰对外决策。无论是推动中美建交，还是在中东穿梭外交，基辛格诸多外交行动展现了一位职业外交家的素养，尽可能避免掺杂国内党派之争与个人私利。然而今天，美国一些政客更多从党派政治出发，将国家的对外战略当成

是攫取国内政治筹码的工具，当成是捞取个人政治利益的手段，极大挤压了理性务实的空间。在这方面，基辛格的职业素养是他们欠缺的，也是亟待弥补的。

此外，美国政客还应把眼光放长远，以对历史负责的方式推进对外战略。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基辛格处理国际问题时抓住国家关系的实质，并考虑世界发展的大背景。对于中美关系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他多次指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取决于中美两个社会之间的互相理解；中美之间如果爆发“新冷战”不仅对两国、对全世界都将是灾难。在百岁生日前夕接受采访时，他再次指出，人类的命运取决于中美两国能否和平相处，并建议美国政客认真考

虑中国的担忧。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半个世纪前中美之间创造性地握手，为处理当下的中美关系带来启示和借鉴。中方提出中美应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是中美关系50多年经验的积累，也是新时期中美正确的相处之道。

“中国和美国有可能在不相互威胁全面开战的情况下共存吗？我过去认为可以，现在仍然认为可以。”基辛格近日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这样说。希望美方汲取前辈政治家的智慧，回归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回归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正轨。这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世界利益，或许也是百岁基辛格最期待的生日礼物。

广州：夏明(印尼侨桥)

我在《想起山口洋》一文中，提到了想起山口洋许多侨领、老师、同学、文友，唯独没有提到好友张笑梅。我早就想好了，专门为他写一章，因为我与他的友情太铁了，三言两语无法表达清楚。

张笑梅原名张志顺，生于1935年，2003年去世，享年68岁。今年是张笑梅逝世20周年。张志顺用过的好搭档，他是中锋，我是后卫，当我从篮板摘下篮球，第一时间就想到把球送到在急速往前冲的张志顺手中，他高高跃起投篮的英姿，至今还印象深刻。

张志顺的妈妈老满姐，当年在山口洋可谓街坊皆知，因为她制作的菜包板热销在大街小巷。老满姐生养了四个男孩，个个都很优秀，大男孩早在中国大陆解放战争年代就投身解放区参加革命，建国后在北京民航部门工作，老二张石松是山口洋最早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激流读书会的创始人之一，与夫人陈恩娥都是中华小学的教师，老三张全清与夫人陈春花也都是中华小学的教师。1962年，我在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办事处工作，应雅加达群益学校校长余国万的要求，推荐了张志顺、黄云政、黄振敏、黄法琪、余兆琪等五位华校教师到雅

们同学喜欢到西华运动场踢球，张志顺是绿茵场上的猛张飞！他颠球、倒勾射门、跃起凌空抽射(我们叫做“双飞燕”)，非常犀利，是我的足球偶像。而真正与张志顺交往是在1956年，我到邦夏中华小学教书，与他成为同事以后。那时，我们没有再踢足球，在篮球场上我们又成了好搭档，他是中锋，我是后卫，当我从篮板摘下篮球，第一时间就想到把球送到在急速往前冲的张志顺手中，他高高跃起投篮的英姿，至今还印象深刻。

张志顺的妈妈老满姐，当年在山口洋可谓街坊皆知，因为她制作的菜包板热销在大街小巷。老满姐生养了四个男孩，个个都很优秀，大男孩早在中国大陆解放战争年代就投身解放区参加革命，建国后在北京民航部门工作，老二张石松是山口洋最早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激流读书会的创始人之一，与夫人陈恩娥都是中华小学的教师，老三张全清与夫人陈春花也都是中华小学的教师。1962年，我在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办事处工作，应雅加达群益学校校长余国万的要求，推荐了张志顺、黄云政、黄振敏、黄法琪、余兆琪等五位华校教师到雅

想起文友张笑梅



2003年，笔者在张志顺夫妇家中做客

加达群益学校教书，张志顺与该校老师梅莉莉结婚。1966年华校被封后，梅莉莉一直从事汉语家庭补习班课堂工作，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贡献。

学校被封以后，张志顺被迫走街串巷当货郎，后来一直开瓦弄(小杂货店)到。就在小杂货店里头，张志顺文思大动，写下无数短小精悍的文章在华文报纸的副刊发表。尤其在1980年后，在《印度尼西亚日报》副刊发表了许多精彩的文章。张志顺发表过作品的华文报刊有《黎明报》、《忠诚报》、《火炬报》、《革命日报》、《南

洋文苑》、《觉醒周刊》等等。

1993年我第一次回到印尼探亲，拜访张志顺，他请我吃菜包板，还把他的作品剪贴送了一本给我。临别，他从店里抓了一大把印尼特产咖啡糖要我带回大陆给孩子们尝尝。我回到家里，打开那本剪贴本，里头夹了一张百元美钞。因为他知道，当年在大陆的归侨，大部分生活水平还不如在印尼的华人，是公司出资给我探亲路费的。后来，他又出费用，托友人从香港给我寄来雅加达地图。

1997年，张志顺夫妇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印尼

国门，到台湾、香港、北京、南京、广州走马看观光，我与夫人在广州白天鹅宾馆接待他们，他们在宾馆的故乡水景观前激动流泪——终于看到故乡啦！2003年我第二次到印尼探亲，临别，张志顺留我在他的新家住宿(一次火灾烧光了他所在的小巷的民居，张志顺所有发表过的文稿都付之一炬，幸好我在出发探亲前已经知道，就把他1993年送给我的剪报本归还，他如获至宝)，当晚，我们俩聊天到拂晓。没想，这竟是我俩的诀别——2003年12月3日，志顺兄走完他顽强的一生。2007年，我收到了由他的侄女张颖操办并寄来的、由印华作协出版的张笑梅文集《露天下的摇篮》。张颖在后记里写道：“本书收集了小品杂文71篇，诗歌47篇。虽然不是惊人的创作，但它记载了一个写作者孜孜不倦埋头耕耘的劳作成果……”

苏哈托排华、反华集团对在印尼的中华文化的打压、禁锢长达32年之久。但是。源远流长五千年始终不间断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是小丑苏哈托能禁锢得了、能封杀得了的吗？看如今，全世界掀起的汉语热，遍布世界的孔子学院、鲁班工坊、

汉语桥，蓬蓬勃勃、方兴未艾，中华优秀文化、中华文明犹如滚滚长江黄河水，奔腾不息永流传，就是对在十八层地狱下的苏哈托与他的走狗及其在西方的幕后主使人的最好的鞭挞和讽刺！看看当前的印尼，中印友好之歌越唱越响亮，新一代的中华文化传承人在逐步成长。

虽然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到了耄耋之年，张志顺的侄儿这一代，也已经接近古稀之年，但是，我相信，青壮年一代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传承人已经成长，他们一定会高高举起先辈的旗帜，把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我寄希望山口洋的文化教育界的朋友们，把山口洋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过而被禁锢被摧毁的许多好作品，如文彪(黄南盛)、伊凡、钟展天(管天来)、林木森、林乐天(林硕福)、五柳先生(张潜)、流浪闻莺(黄保顺)、路不平(张石松)、李静(李培坤)、张笑梅(张志顺)以及坤甸的海浪、林浮萍(林长海)的散文、诗歌、小说都找回来、挖掘出来，把他们编印成册，让后辈分享，留下一页千古。

我的愿望也是对张笑梅兄逝世二十周年最好的纪念。

青年誓言和国歌《大印度尼西亚》(1)

迪迪·瓜尔塔纳达(DIDI KWARTANADA)



瓦格·鲁多尔夫·苏伯拉曼

donesisch Club)举行。

在第三次会议上，青年代表们决定发表著名的“青年誓言”(Sumpah Pemuda)(Sularto, 1986:55):

第一，我们印度尼西亚儿女，只承认一个祖国——印度尼西亚。

第二，我们印度尼西亚儿女，只承认一个民族——印度尼西亚民族。第三，我们印度尼西亚儿女，使用统一的语言——印度尼西亚语。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青年代表们把瓦格·鲁多尔夫·苏伯拉曼(Wage Rudolf Soepratman)(1903-1938)所作的歌曲——《大印度尼西亚》定为国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在印尼国族(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无论是青年誓言，还是这首国歌，都与华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楼房的主人

当年，正是在格拉默街(Jalan Kramat)106号俱乐部大楼，发表了青年誓言，奏响了《大印度尼西亚》，如今这个地方已成为青年誓言博物馆(Museum Sumpah Pemuda)。它由一座主房和14间



青年誓言博物馆

小房(Paviliun)组成，是华人施光隆(Sie Kong Liang)持有。

起初，巴达维亚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学生人数不断增多。为满足学生们的住房需要，施光隆出租了不少寄宿公寓。一些曾在此处寄宿的学生，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领导人，如阿米尔·沙里夫丁(Amir Sjarifuddin)(曾任总理)、穆罕默德·亚敏(Muhammad Yamin)(曾任教育文化部部长)、阿萨阿德(Assaat)(曾任印尼总统的官员)等等。由于施光隆的房子位置极好，空间宽敞，学生们经常聚集在此开展文艺训练，讨论政治局势(Darmansyah et al., 2010: 2-3)。后来，青年代表们仍选择在这里召开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Kongres Pemuda II)。

青年誓言发表80周年之际，印尼《时代》周刊(Tempo)(2008: 48-49)希望通过追踪施光隆的足迹，制作80周年特别报道。但是，他们找不到亮点，只能总结道：“这幢楼房的主人，与为印尼独立而斗争的青年们感同身受。”

大会的参与者

据青年誓言博物馆(Museum Sumpah Pemuda)资料记载，至少有四位土生华人青年参加第二届青年代表大会(Kongres Pemuda II)。郭添丰(Kwee Thiam Hong)出生在南苏门答腊巨港市(Palembang)，是苏门答腊青年协会(Jong Sumatranen Bond)成员。那时候，郭添丰才十几岁，在巴达维亚的一所荷兰学校上初中(Meer Uitgebreid Lager Onderwijs，简称 MU-

LO)。他活跃于社团组织，担任苏门答腊青年协会在校分会的理事；也在该青年协会童军担任队长兼鼓手。1978年10月25日，郭添丰在接受《罗盘报》(Kompas)采访时说道，其他与会者并没有对华人青年的出席感到诧异或不满，也没有人议论这件事。他还说，他参加印尼民族主义活动，是因为受到佐克罗阿米诺多(H.O.S Tjokroaminoto)和苏加诺(Ir Sukarno)的演讲的影响。郭添丰(Kwee Thiam Hong)后来改名为达乌德·布迪曼(Daud Budiman)(Jahja, 2003: 38-39)。

1928年10月28日的会议是公开会议，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于是，郭添丰便邀请了他的三位好友——黄凯祥(Oey Kay Siang)、刘泉福(John Liauw Tjoan Hok)、蒋仁贵(Tjio Djin Kwie)一同参会(Jahja, 2003:38-39)。

在700多位与会者中，留下名字的82人已被记录在青年誓言博物馆中，永垂不朽；出席大会的四位华人青年的名字，也载入了《青年誓言博物馆指南》(Buku Panduan Museum Sumpah Pemuda)(Darmansyah et al., 2010: 18-19)。



KWEE THIAM HONG SAKSI MATA SOEMPAH PEMOEDA. REPRO PERANAKAN IDEALIS

郭添丰(Kwee Thiam Hong)，青年誓言的见证者《大印度尼西亚》歌谱的出版者国歌《大印度尼西亚》的作者W·R·苏伯拉曼(W.R. Soepratman)，是巴达维亚著名报刊《新报》(Sin Po)的记者(详见第二部分《土生华人新闻界》)。

由于职业的缘故，苏伯拉曼可以经常接触参与政治运动的青年——他们时常聚集在格拉默街(Jalan Kramat)106号公寓。

郭克明(Kwee Kek Beng)(1948: 35)是当时《新报》的主编。他回忆道：“以前，印尼政治运动的领导者与华人新闻界的关系，尤其是与《新报》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苏伯拉曼创作的《大印度尼西亚》连词带谱首次刊登在《新报》周刊(Weekblad Sin Po)上，绝不是偶然事件。”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未完待续)